

#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国际发文的几个特征事实\*

## ——基于 SSCI 的分析

魏众 蒋颖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提高,中国经济问题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表现为,国际研究论文数量持续快速增长,参与研究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增多,发表在高质量期刊的论文也快速增加。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承担了通讯作者的角色,逐渐主导了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如此,他们参与论文的影响力也在逐步提高。和国际潮流相一致,作者合作度和合作论文占比也迅速增加,中国作者与另一研究大国美国作者之间的合作是国际合作中的主流。就主题而言,聚焦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或者对中国经济发展现象做出学理化概括的那些文章往往能够成为高被引论文。

**关键词:**中国经济 国际学术论文 影响力 特征事实

### 一、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国际论文概览

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仍处在低收入国家行列,在世界经济体排名中甚至低于印度而位于十名之外。当时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也不是国际经济学研究热点,作为中国问题研究的一部分从属于区域或者国别研究,仅仅被一些中国问题研究者(或称汉学家)所关注,每年被 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收录的论文只有不多的几十篇。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转而关注中国经济发展问题,并开始在国际上发表论文。与早期的汉学家有所不同,这些经济学家对于中国国情了解不足,但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能力则更强,他们的介入带动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向专业化方向发展。

在我国,2007年以后,有关部门出台了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服务的有关规定,同时在学术评价政策方面鼓励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sup>①</sup>。再加上中国经济在此期间逐步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往来不断加强。中国经济问题不再是区域和国别问题,而成为全球经济学家共同关注的话题。

上述种种利好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此后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的快速增长。

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国际论文的增长及分布情况,本文搜集了 SSCI 数据库 1978—2017 年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的数据,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数据分析。具体方法为:

2018年4月13日,利用 SSCI 数据库进行主题词检索,检索词为:“China OR chinese”,文献类型为“Article”,时间范围为 1978—2017 年,Web of Science 学科类别为“ECONOMICS”。通过检索共得到 12642 条记录。获得数据之后,我们利用科睿唯安的 DDA 软件对数据进行了清理和统计。

为了便于比较,我们按照每十年一个阶段,将这四十年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7

\* 魏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邮政编码:100836,电子邮箱:weizhong@vip.sina.com;蒋颖,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邮政编码:100732,电子邮箱:jiangying@cass.org.cn。

① 参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2761/200905/47781.html。

年(233条);第二阶段:1988—1997年(724条);第三阶段:1998—2007年(2008条);第四阶段:2008—2017年(9677条)。

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我们发现前两个阶段中,部分信息未能完整标引。其中,第一阶段,作者机构、国家和地区字段覆盖率均为24%,期刊字段覆盖率为78%,通讯作者字段覆盖率为79%,其他重要字段均为100%;第二阶段,作者机构、国家和地区字段覆盖率均为36%,期刊字段覆盖率为92%,通讯作者覆盖率为85%,其他重要字段均为100%;第三阶段,作者机构、国家和地区字段覆盖率均为96%,通讯作者字段覆盖率为95%,其他重要字段均为100%;第四阶段,作者机构、国家和地区、通讯作者字段覆盖率均为98%,其他重要字段均为100%。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香港地区数据的标引分为两个阶段。从1997年开始,中国香港地区学者的发文纳入中国的统计数据中,1997之前的数据仍标识为“中国香港地区”。

另外,由于SSCI收录范围所限,我们搜集的数据仅包括了以英文为主的期刊所发表的论文,没能收录俄文、日文等其他语种的文献,因此对于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用非英语发表的论文情况没能包括在内。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分析研究,我们发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国际论文有这样一些特征事实: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的提高,中国经济问题国际研究论文数量也持续快速增长;第二,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国家和地区日益增多,不断增长的国际经贸往来进一步推动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热情;第三,中国学者<sup>①</sup>越来越多地承担了通讯作者的角色,在相关研究中逐渐起主导作用;第四,中国学者在中国经济问题领域国际发表论文的影响力逐步提高;第五,随着中国经济问题国际关注度的提高,发表在高质量期刊的论文快速增加;第六,在全球科研合作的趋势下,作者合作度和合作论文占比迅速增加;第七,美国作为该领域研究的另外一极,也是中国最大以及最重要的合作对象;第八,那些聚焦中国经济发展重大问题,以及做出学理化概括的文章获得更高被引。

## 二、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和国际论文数量

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期刊发文量,明显地与中国经济成长以及融入全球经济的状况密切相关。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初期,中国经济总体而言还是一个内向型的经济体,国外对中国经济的关注程度不高,至多作为一个区域(国别)经济问题或者转型经济问题来研究,并不属于国际经济研究的主流内容。另外,当时的中国学者英语水平普遍不高,能用于国际合作的外汇也比较有限,同时国内外研究范式存在较大差异。以上因素限制了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发表。这个时期中国经济问题既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中国自身也缺乏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能力。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逐步转型为外向型经济,对外开放力度不断增强,大量吸引了国外直接投资。从GDP总量来看,自1992年起,中国经济进入全球经济体前十,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开始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另外,中国的对外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开始与全球经济产生较强的互动关系,这进一步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程度。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问题论文的国际发表数量明显增多,但主要来自国外学者的著述,国内学者的论文还不多。

此后,通过几年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逐步和一些欧洲老牌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拉近了距离,1998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在此之后的近10年时间里,经济总量也逐步超过了意大利、法国、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从这个时期开始,中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这就意味着不仅世界经济会影响中国,中国经济也开始影响世界。这一时期全球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开始较快增加,从之前的每年不足百篇,发展到2007年的418篇。中国的学者开始成规模地走上世界学术舞台,发表学术论文。

<sup>①</sup> 文中的中国学者基于作者署名的学术机构来判断,即其署名的学术机构为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1997年之后)的学术机构。其中包含被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地区聘用的国外学者,但不包含未署名中国机构的华裔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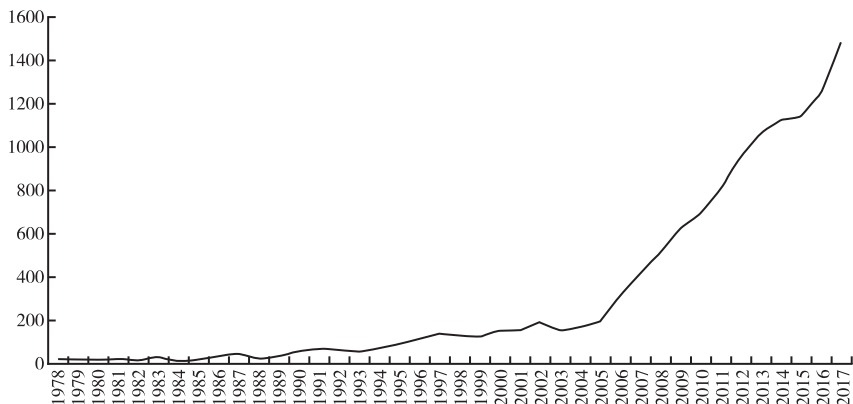


图1 1978—2017年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主题的发文章量

2006年7月《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发布,其中提到“突破阻碍研究人员有机组合和资源共享的学科壁垒、院系壁垒、学校壁垒和区域壁垒,鼓励跨学科、跨院系、跨学校、跨地区、跨国度组合研究力量,形成机构开放、内外联合、良性竞争、优胜劣汰、有利创新的研究合作体。”同时提到“建立鼓励高质量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由此,国际论文的发表进入教育部评价体系并占据重要的位置<sup>①</sup>。2007年3月,教育部进一步发布了《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给出具体措施吸引海外留学人员归国任教等等<sup>②</sup>。这些措施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学者在海外发表学术论文。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问题也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长越来越引起全球经济学家的关注。中国经济总量在2010年进一步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美国的差距在逐步缩小,同时进一步扩大了对身后追兵的领先优势。与此相对应,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论文数量增长迅速,到2017年,SSCI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的年度收录量已达到1482篇。中国学者参与国际学术研究和发表论文的热情被激发,在2017年的国际论文中,中国学者参与了约三分之二,其中一半论文的作者全部来自中国机构。

### 三、关注中国经济问题的国家和地区增多,不断增长的国际经贸往来进一步推动了相关国家和地区的研究热情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中国经济问题关注的国家和地区也在增多。在本研究的第一阶段(1978—1987年),论文的作者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除中国大陆外大多来自OECD国家。其中,发表论文最多的是美国作者,其次是中国大陆,第三是英国。在本研究的第二阶段(1988—1997年),论文作者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发表论文最多的仍旧是美国作者,其次是中国大陆,第三名是澳大利亚,英国排在第四位。其他发文章量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包括加拿大、中国香港地区<sup>③</sup>和日本。除来自OECD国家的作者外,一些亚洲邻国和地区也有不少的贡献,此外,参与研究的国家还包括一些转型国家以及一些具有区域影响力的国家等。第三阶段(1998—2007年)的研究者来自52个国家和地区,发文章量排在前十的国家和地区依次为:美国、中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法国、

① 参见《教育部关于大力提高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质量的意见》,教科社[2006]5号, [http://www.gov.cn/zwgk/2006-07/10/content\\_331906.htm](http://www.gov.cn/zwgk/2006-07/10/content_331906.htm);李卫红,2006:《总结“十五”规划“十一五”开创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新局面》, [http://www.moe.gov.cn/s78/A13/moe\\_1204/tnull\\_17698.html](http://www.moe.gov.cn/s78/A13/moe_1204/tnull_17698.html)。

② 参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引进海外优秀留学人才工作的若干意见》,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2761/200905/47781.html](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moe_2761/200905/47781.html)。

③ 本研究的第一和第二阶段,SSCI的国别标引不够完整,全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中,只有约1/4的论文标引了国别。此外,在1997年之前,中国香港地区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地区标引的。

中国台湾地区、荷兰。但中国作者参与的论文数量逐渐接近美国作者。在这一阶段,除欧美发达国家和东亚的国家和地区外,中国经济问题开始引起一些转型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关注。第四阶段(2008—2017年)论文的作者来自101个国家和地区,说明中国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全球瞩目的热点话题。在最近这十年,中国大陆作者参与的论文数量超过美国排在第一位,第三位是英国,以下依次是澳大利亚、德国、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加拿大、法国、荷兰等。

虽然前两个阶段的数据标引不完整,但是从这些数据的趋势中还是可以看出一些明显的变化。如果将这些国家分类进行分析,则可以明显看出,除中国大陆和当时尚未回归的中国香港地区以外,早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主要受到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注,这一时期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国别和区域研究范畴。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问题受到了更多国家的关注,邻近的国家和地区因为经贸往来而开始参与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加入WTO和中国经济快速地融入全球经济,全球几乎所有较为重要的经济体都开始关注和研究中国经济相关问题,中国学者自然以更为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最近十年中,中国学者渐渐成为论文的最大提供者。中国经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换言之,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发了国际学者的关注,而中国经济与其他国家越来越多的经贸往来则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热度。

从合作研究的视角考察,我们发现,与中国合作的国家和地区数量较多,不同阶段共涉及65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作者最主要的合作者来自美国,中国作者与美国作者合作发表的论文(也可能有其他国家作者参与)占中国作者国际合作论文的将近一半(49.82%)。其次是英国(11.67%),接下来是加拿大和日本,与上述国家作者的合作占中国国际合作论文的比重均在5%以上。与美国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时间较长有关,与美国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共有72个,其主要合作对象除中国外,还有英国、加拿大等。但在最近二十年,中国和美国均加大了国际合作的力度,尽管中国学者在该领域参与论文的发表数量已远远超过美国,但中美双方的合作国别总数仍大致持平。

#### 四、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主导了相关研究

与国内中文期刊不同,国外经济学期刊的作者署名顺序大多按姓名音序排列,因而传统的按贡献大小进行作者排序的方法不适于经济学国际论文。在经济学的合作研究中,通讯作者通常被认为是论文贡献较大的人。因此,为了解各国学者在国际论文合作中的作用,我们对通讯作者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

考虑到早期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国际论文数量相对较少,国别标引也不够规范,同时该领域较多的国际论文是从大约20世纪末开始出现的,此后的国际论文数量和质量都开始迅速提升。因此本部分研究选取最近20年作为统计的时间范围,即1998—2017年发表的国际论文作为研究对象。

1998—2017年间,共有85个国家和地区的学者以通讯作者身份发表了论文。其中,来自中国的通讯作者发表论文数量最多,为4459篇,约占全部论文的36%。美国排在第二位,发表论文数量为2740篇,占全部论文的22%。其他占比较高的国家和地区包括英国、澳大利亚、中国台湾地区、日本、加拿大、德国、法国、新加坡等。

为更好地分析判断不同国别通讯作者的变动趋势,本文对通讯作者的国别年度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从图2中可以清楚看到,1998—2017年期间,中国作者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数量和比例均不断增长,中国通讯作者的发文量从1998年的7篇增长到2017年的744篇,中国通讯作者发文占比则从1998年的5.38%增长到2017年的50.20%。其中,在2007年来自中国的通讯作者发文量超过美国,并从此进入快车道;与此相对,尽管美国作者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绝对数量仍在不断增长,但却低于该领域论文发表的增长速度,从而造成其占当年全部发文量的比例不断下降,美国通讯作者发表的论文数从1998年的52篇增长到2017年的210篇,但占比却从1998年的40%下降到2017年的14.17%。中美通讯作者发文量和占比呈现明显的剪刀型分布,这说明中国学者越来越多地主导了该领域的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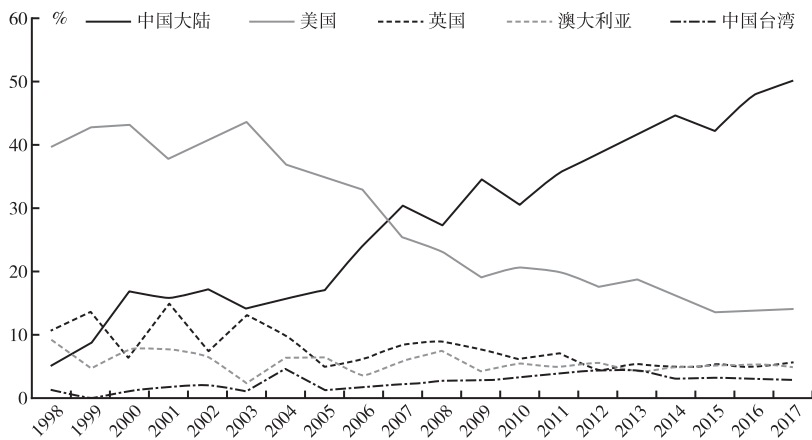


图 2 1998—2017 年五个国家和地区的通讯作者发文量分布

### 五、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水平提高,发表在高质量期刊的论文快速增加

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研究论文不但数量上增加很快,同时研究水平也不断提高。正如前文中谈到,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热吸引了世界各国更多的经济学家参与进来。他们的研究具有更加专业性的特点,也更容易为经济学主流期刊所接受,这一点在 SSCI 数据上也得到了体现。这里主要基于公认的五个顶级经济学期刊里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的发表情况进行分析,这五个期刊分别为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Quarter Journal of Economics(QJE)、Econometrica(EMA)和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RES),具体情况见表 1。

从表 1 明显可以看出,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四十年来在五大顶级期刊中共发表了 129 篇文章,其中将近一半是在最近十年发表的,最近十年的发文量是第一个十年发文量的近 10 倍。而且从目前的趋势看,该领域在国际经济学顶级期刊发表的论文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如果考虑到在顶级期刊发表越来越难的事实(Card & DellaVigna,2013),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在五大顶级期刊中的表现确实很不错。不仅如此,中国作者的表现也越来越好,论文发表经历了从无到有的阶段,而且通讯作者所占比重也在逐步增加。但如果我们将中国作者在五大顶级期刊中的发文数据与在 SSCI 中国经济研究论文总体中的数据进行比较的话,则是另外一幅图景,即中国学者参与的论文以及中国作者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占比仍偏低,这说明国内学者和国际经济学最高水准的差距仍较大。

表 1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在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发表情况

期刊名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合计
AER	3	13	26	27	69
EMA				4	4
JPE	1	6	9	7	23
QJE	2	5	4	11	22
RES			2	9	11
总发文量	6	24	41	58	129
中国学者参与论文	0	2	5	16	23
中国通讯作者论文	0	2	2	8	12

进一步,我们使用一个较为公认的经济学优秀期刊目录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的表现、中国作者的表现进行研究<sup>①</sup>。与五大顶级期刊呈现出来的趋势类似,该领域论文发表在近四十年间也出

<sup>①</sup> 期刊目录来自国内各高校对国际经济学期刊的分级目录。因为目录和表格较长,文中忽略,有兴趣者可以和作者联系。

现了快速增长,其中最近十年的发文量为最初十年发文量的16倍,增长速度比五大权威期刊相对更快一些。对于中国学者的情况,我们也做了专门的分析。在1998—2007年,中国学者参与论文97篇,占上述期刊中国经济问题论文总数三成左右,而2008—2017这十年间,中国学者参与论文数为348篇,略强于该阶段全部发文量的一半。而中国学者作为通讯作者的占比在最近十年增长迅猛。在1998—2007年,中国学者作为通讯作者的论文占中国学者参与论文的不足六成,而在2008—2017这十年间,这一比例提高到三分之二。

表2 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在51种优秀(含顶级)经济学期刊上的发表情况

期刊名称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第四阶段
中国经济问题全部论文	43	148	323	691
中国学者参与论文	5	16	97	348
中国通讯作者论文	4	12	57	232

从以上两个比较来看,经济学领域国际优秀期刊上发表了越来越多的有关中国经济问题的论文,而中国作者在该领域论文在国际顶级和优秀期刊发表方面也可圈可点。中国作者参与的论文在上述期刊的发表量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同时中国学者作为通讯作者的增长更为迅猛。所以尽管在高质量论文发表方面,中国学者仍处于劣势,但增速很快,与国际学界的差距呈现收敛的态势。

## 六、在全球科研合作的趋势下,作者合作度和合作论文占比迅速增加

随着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科学规模逐渐增大,作者的合作模式也逐渐发生改变。在生物学、高能物理学领域,百人以上的作者已经很常见,出现千人甚至三千人以上的作者共同完成的论文也不奇怪,有研究者称之为“超级作者”(hyperauthorship)现象(Cronin,2001)。

在这种大环境下,人文社科领域的合作研究也呈增长趋势,虽然没有出现自然科学那样超大规模的作者合作,但是同几十年前相比,合作率也在增长(Ossenblok et al,2014)。其中,经济学领域的合作现象更为明显,这也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多项研究均表明,经济学研究领域的合作率不断增长,合作规模不断增大(Hamermesh,2013;Rath & Wohlrabe,2015;Kuld & O'Hagan,2018;Seltzer & Hamermesh,2018)。Hudson(1996)认为,二战之后经济学家是典型的个人工作者,到20世纪90年代,更倾向于至少两个人的合作。近年,三到四个人的合著论文也增加很快(Rath & Wohlrabe,2015)。Card & DellaVigna(2013)对1970年以来经济学五大顶级期刊(AER、EMA、JPE、QJE、RES)的论文进行的分析,发现合作度明显提高,篇均作者数从1970年的1.3人提高到2012年的2.3人。

从本文的数据来看,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学研究国际论文的合著比例大幅增长,合作规模不断扩大,合作成为绝对的主流。论文的最大合作人数从5人增加到23人,平均作者合作度从1.22人增长到2.57人。从第二阶段开始,合著论文比率在每一阶段都出现明显的递增势头。第一阶段合著论文只占全部发表论文的18.88%,到了第四阶段,合作和独著的情况刚好反过来,合著论文的比例达到80.46%,独著的论文只有不到20%。合著已经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常态。

表3 1978—2017年独著与合著统计

阶段	发文量(篇)	增长率(%)	平均合作度	合著(%)	合著论文量(篇)
第一阶段	233		1.22	18.88	44
第二阶段	724	211	1.56	40.61	294
第三阶段	2008	177	2.03	61.95	1244
第四阶段	9677	382	2.57	80.46	7786

从合作规模来看,在第一阶段,独著论文始终占据主流地位,占全部论文的一半以上;第二阶段,合著论文数逐渐增多,逐渐接近独著论文数;第三阶段,两位作者合作的论文在数量上全面超越独著论文,二人合作成为最主要的合作形式;第四阶段,合作规模继续增长,到2017年,三人合作的论文数超过两人合作的论文数,三人合作成为论文数量最多的合作类型。

在SSCI收录的论文中,国际合作十分普遍。在本文的数据中,共涉及10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相当多的论文都是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合作。参与国际论文合作的作者比较多地集中在这样一些国家和地区:北美的美国和加拿大,欧洲的英国、德国、法国、荷兰等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以及东亚文化圈的日本、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和韩国。

在中国作者参与发表的论文中,中外合作的比例超过中国发文总量的一半(51%),全部由中国作者完成的论文占49%。如果考虑到后者中的一部分是独著,即作者可能是一位中国作者,那么在合著论文中,中外合作占了合著论文的大部分。由此可见,国际合作对于中国学者在海外的论文发表非常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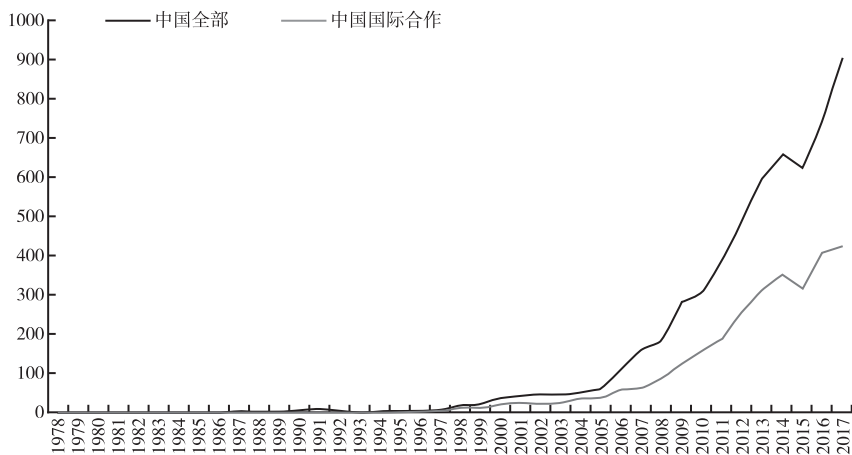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发表论文及国际合作情况

如果基于汇总数据考察,则会发现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论文合作量与全部由中国作者完成的发文量一直不相上下;但如果从年度分布情况和趋势来考察,则会发现完全由中国作者撰写的论文数量近年增长较快,且在2017年已经超过了中国学者的国际合作论文数。即尽管每年中外合作论文数量呈不断增加的趋势,但中国国内学者独著或合著论文增长得更快。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国内学者在国际学术舞台上越来越具备竞争力。

### 七、中国作者研究论文的影响力在提升

如果简单地比较一下四十年来论文影响力的重要指标——篇均被引频次,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即中国学者SSCI发表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质量不高,影响力不大。因为无论是对比总体情况,还是与没有中国学者参与的论文情况进行比较,中国学者参与论文的被引频次皆显著地落后(见表4)。中国学者参与论文的篇均被引量仅为全部论文的89.4%,是那些没有中国学者参与论文的81%。看起来,中国学者的研究水准不高,论文影响力较弱。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前些年对中国自然科学国际论文引用率低的批评,但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分阶段来解析数据,我们发现,中国学者发表论文有一个逐步增加的趋势,在前三十年,中国学者参与论文占比较小,而在最近十年间,中国学者参与论文占比较大。基于图5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引用高峰大多发生在本文划定的第二和第三阶段(1988—2007年)。大致范围为1992—2009年这个时期发表的论文,特别是1998—2007年。这个结构性的差异对中国学者论文的表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表 4 1978—2017 年国际论文中不同类型合作的合作度与被引频次

论文类型	论文数	篇均被引量
总体	11845	14.97
中国参与	5830	13.38
非中国参与	6015	16.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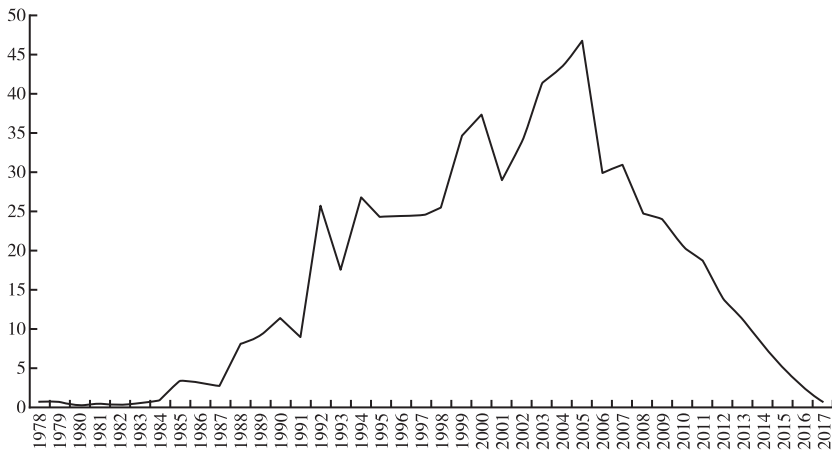


图 4 1978—2017 年发表论文年均被引用比例

注:引用时间范围:发表以来被 SSCI 所引用。

考虑到中国学者论文的发表时间具有结构性特征,本文采取了一个方案,即将被引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除以当年总体篇均被引量)。然后,我们发现总体而言,中国作者参与的文章品质并不像总体数据表现的那么差,甚至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戏剧性的逆转。由于年度分布表格比较繁杂,所以本文采取了更为简明的表现形式:分阶段进行考察。我们发现,在前三个阶段,中国学者参与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均高于无中国学者参与的论文,而即便在第四个阶段,中国学者参与论文的篇均被引频次也仅仅是略低于无中国学者参与的论文。然后当我们将视线放在发文量时间结构的时候会发现,在被引频次较高的第二和第三阶段,无中国参与的论文数量远远超过中国,而这两个阶段的篇均被引频次,无论是中国学者参与的论文还是无中国学者参与的论文,均远远高于第四阶段。这就是说,一个可能的事实是中国学者参与发表论文最多阶段(第四阶段)的被引高峰期还没有到来!

表 5 中国学者参与论文与非中国学者参与论文的阶段性结构比较

	发文量(篇)	中国参与		非中国参与		
		占比(%)	篇均被引	发文量(篇)	占比(%)	篇均被引
第一阶段	7	0.1	9.6	50	0.8	6.1
第二阶段	48	0.8	38.1	219	3.6	25.3
第三阶段	607	10.4	36.5	1335	22.2	34.8
第四阶段	5168	88.6	10.4	4411	73.3	10.7
全部	5830		13.4	6015		16.5

## 八、美国学者是中国学者最大、最重要的合作对象

在 SSCI 刊登的所有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中,中国和美国的作者几乎占了 68%,中美两国是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双雄。其中,中国作者参与论文数为 5830 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 49.2%;美国作者参与论文数为 3704 篇,占全部论文数量的 31.3%,在所有国家和地区中排在第二位,仅次于中国;在前三个阶段的近 30 年时间里,美国学者参与论文数量一直超过中国学者,直到 2007 年,中国学者参与论文数量首次超过了美国学者并一直持续至今。

在美国学者发表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论文中,中美学者合作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美国学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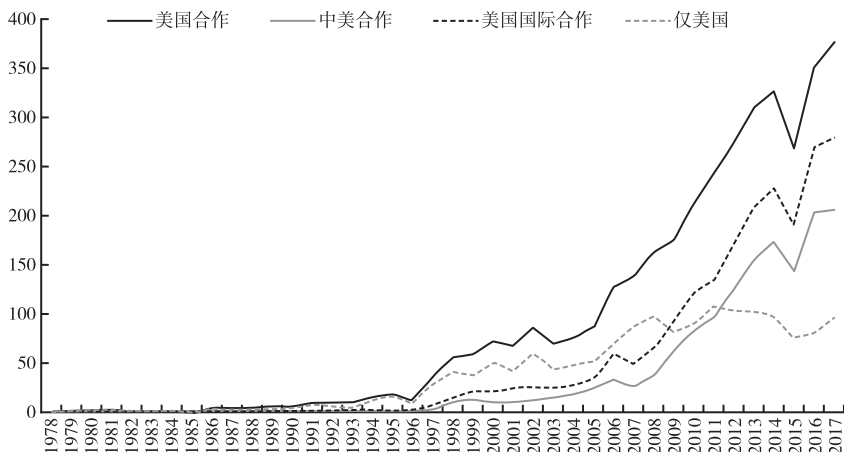


图5 美国发文及合作情况

是中国学者的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合作对象。四十年来,中美学者合作论文数量为 1488 篇(含其他国家和地区学者也参与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 15.7%,约占中国作者参与论文的四分之一以及美国作者参与论文的四成。不仅如此,有关资料显示,1990 年以来,美国在经济学研究领域的跨国合作迅速增长,英国学者一直是美国学者最大的国际合作伙伴;而中美合作增长迅速,2012 年,中美合作论文数首次超过美国内部合作的论文数。到 2015 年,中国已成为美国经济学研究领域国际合作第二多的国家(Kuld & O'Hagan, 2018)。此后,中美学者合作论文占美国学者国际合作论文的比例一直在 70%以上,占美国学者参与发表的全部论文的 50%以上,美国学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跟与中国学者合作的步调基本一致。美国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越来越多地受到中国的影响。

目前,尽管在发文量、通讯作者占比乃至总体被引用量上,中国学者参与论文超过美国,然而,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影响力仍不可小视,特别是在论文被引频次方面。该领域研究论文的被引总量中国稍稍领先美国,但美国作者参与论文仅相当于中国作者参与论文的 63%,所以美国作者参与论文的篇均被引次数远远大于中国作者的篇均被引。尽管也存在前述中国作者发文存在结构性问题的情况,但美国作者在被引量最高的第三阶段(1998—2007)和发文量最多的第四阶段(2008—2017),其被引率均显著高于中国学者。此外,基于我们对该领域高被引文献的统计,美国学者参与论文中的高被引论文数目前仍高于中国学者。所以,我们也应当承认,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国际论文方面,美国学者论文在各种总量指标上已被我们超越,但其篇均指标,即质量指标,仍明显好于我国学者的论文。这应当是我国学者下一步努力赶超的目标。

表6 分阶段发文量和篇均被引:中美比较

	中国学者参与		美国学者参与		全部论文	
	发文量	篇均被引	发文量	篇均被引	发文量	篇均被引
第一阶段	7	9.6	23	6.6	57	6.6
第二阶段	48	38.1	129	38.0	267	27.6
第三阶段	607	36.5	845	42.7	1942	35.3
第四阶段	5168	10.4	2707	12.8	9579	10.5
全部	5830	13.4	3704	20.5	11845	15.0

### 九、聚焦中国经济热点问题的高被引论文及其学理化概括

高被引论文永远是文献研究的高光点所在,本文也概莫能外。本文选择被引 200 次以上的论文(以下称高被引论文)进行分析,主要集中在发表期刊、研究主题和作者三个方面,以期从中总结论文高被引的一些规律。

首先看这些高被引论文发表期刊的分布情况:Quarter Journal of Economics 4 篇, American E-

conomic Review 3 篇,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 篇,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 篇, Econometrica 没有, 五刊共计占全部高被引论文的 14%。其他比较集中的期刊包括 Energy Policy, Energy Economics,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以及 China Economic Review 等。从这些期刊名称即可看出, 他们所收录研究论文的研究主题和中国经济问题的主流议题密切相关。

从研究主题来看, 高被引论文主要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与中国经济密切相关的重大或者热点话题的解读和分析; 另一种则是对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现象和特征进行学理化的概括。

第一类的高被引论文在早期比较突出, 目前高被引论文中发表最早的三篇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如林毅夫(Lin, 1992)讨论了中国农村改革和农业增长, 邹至庄(Chow, 1993)讨论的则是资本形成与经济增长, 而洪永森参与的论文(Groves et al, 1994)则讨论了中国国有企业的自主权和激励机制问题。另外一个典型的热点话题是能源和环境问题, 这是全球热点话题在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中的体现, 该领域高被引论文共 15 篇, 分布在三个杂志上, 其中 8 篇发表在 Energy Policy, 5 篇发表在 Energy Economics, 2 篇发表在 Ecological Economics。

由于发展不平衡而导致的区域收入差距问题、个人收入差距和贫困相关问题也是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一个重点, 构成高被引论文的一个组团, 共有 9 篇论文。这方面的代表性作者是来自世界银行的陈绍华和 Martin Ravallion。他们具有对中国农村贫困的长期观察和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完成了多篇关于中国农村贫困研究的文章, 其中两篇论文(Ravallion & Chen, 2003, 2007)成为高被引论文。该组的其他论文较为集中地涉及了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 通过研究给出相关理论分析和解释, 这与党的十九大关于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判断是一致的。

除上述比较集中的主题之外, 中国经济改革过程中的一些重大议题在高被引论文这里也有很多体现。如国有企业改革、国外直接投资、卫生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农民工和城市化等等。

第二类中比较典型的是钱颖一参与的一系列论文。在这些论文中, 他以财政联邦制这样一个概念总结和概括了中国财政分权制, 并因而得到热烈的回应。而他的重要合作者 Weingast 除与钱颖一合作多篇(Montinola et al, 1995; Jin et al, 2005)关于财政联邦制的论文之外, 他(Weingast, 1995)独立完成的论文, 同样关于财政联邦制, 在目前所有中国经济问题高被引论文中被引率排名第二。值得一提的是钱颖一参与的研究论文中有 5 篇进入中国经济问题研究高被引论文, 是所有作者中最多的<sup>①</sup>。

此外,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许成钢(2011)发表的一篇综述论文里正式提出了“地区分权的威权体制”(regionally decentralized authoritarian system, 简称 RDA 体制)概念, 以概括中国独具特色的中央集权和地区分权相结合的政府治理体制。

李宏彬、周黎安(Li & Zhou, 2005)的文章也属于此类, 该文分析了中国改革以来省级主政官员更替与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 这种关系随后被后者在一篇中文论文(周黎安, 2007)中定义为“官员晋升的锦标赛模式”, 该文目前在国内学者高被引论文排名的前列。他俩和另外两位作者合作的一篇论文同样进入高被引论文。

从作者群来看, 除上述已经提到的部分作者外, 在高被引论文中, 我们还可以见到其他一些熟悉的或者华裔学者的名字, 如白重恩、邹恒甫、张晓波等。但另外一些国外的研究者, 由于长期追踪中国经济问题, 从而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较为深刻的认识, 他们往往又具有一些国内学者不太具备的独特视角和分析框架, 从而独立完成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并成为高被引论文, 这也是相当不容易的。如 Narayan(2005)对中国储蓄和投资及其影响的研究, Démurger(2001)采用基础设施建设视角分析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原因的研究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 由于使用了文章开始时提到的检索方法, 也造成很多和中国经济问题有一定相

<sup>①</sup> 因上述发表时钱颖一所属工作单位为国外大学, 故他的这些论文被算作国外学者的论文, 其他论文的国别归属亦如此, 特此说明。

关注度,但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文章也收录了进来,但比例不高。这些论文大多是该领域著名经济学家撰文完成的,有的直接就是他们的代表作。比如,在收入分配领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 Atkinson et al(2011)关于长期历史上的高收入的综述,一篇是世界银行的 Milanovic(2002)关于世界收入分配的研究。其他类似情况如 Stern(2004)关于环境库兹涅茨倒 U 曲线的研究、Popkin(1999)关于城市化、生活方式转变和营养转型的研究等。上述这些论文都是该领域著名学者的论文,并非完全专注中国经济问题,但都在文中以一定的篇幅涉及中国经济问题的相关主题。

因为是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所以并非所有的研究论文都是肯定甚至称赞中国经济表现的,有的则对中国经济或者某些方面持相对否定或者批评的态度。这方面的典型例子是 Young(2000)的研究,他同样使用了一个概念“扭曲”来界定中国改革的成效。他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会带来扭曲,而进一步的改革会带来进一步的扭曲,所以他对中国经济改革前景不那么看好。

总体而言,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高被引论文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大多持正面或较为正面的评价,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很多总结相当精辟,而其中一些研究显然具有较强的前瞻性。他们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及其研究的进步是有较大助益的。

## 十、研究结论

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研究,经过四十年发展,逐步从一个国别或者区域性问题的,上升为热点的国际学术问题,年度发文量迅速提高,参与的学者的国家或地区数量不断增多,论文合作度不断提高,研究论文越来越多地得到高品质学术期刊的青睐。与之相伴的,也是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在这四十年间,中国经济总量逐步超越多个发达经济体而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不仅引起了世界关注,更是因其地位的提升而开始影响全球经济。这进一步推动了国际学术界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关注。

社会科学领域,特别是中国经济问题这样一些中国本土性比较强的问题研究,中国本土学者对国情的了解不得不说是一种重要的优势。与具有更强普遍性的自然科学领域不同。中国经济问题领域这种非常有赖于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等背景了解的领域,中国学者的优势正在逐步发挥出来。中国学者参与论文的发文量已占据优势,通讯作者发文量也已具有相对优势,论文的影响力也在快速接近甚至超过总体平均水平,如果去除时间对引用的影响,则中国学者参与完成的论文与国际平均水准大致相当。而且就近几年的情况看,中国学者的论文质量也有较快的提升,与国际高品质研究的差距在缩小,正处在从数量到质量转换的过程之中,这是影响力背后的主要原因。

但我们也应注意到,我国学者的研究论文在顶级期刊和高水平学术期刊的发文量还不高,与另一个中国经济问题研究大国美国相比,我们在总量指标上实现了超越,但在反映质量的篇均指标方面仍有一定的差距。这方面仍有待国内学者进一步的努力。

在改革开放经历四十年之际,总结中国经济问题国际论文发表的情况,我们发现中国学者的国际发表取得了长足的进步,逐渐逼近了国际同行该领域的最高研究水平,并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出了越来越强的声音。这正是中国开放的大国心态和措施得当的吸引人才和鼓励国际发表的政策指向所造就的。中国经济问题的国际学术发表数量的增加,也有助于世界了解中国,倾听中国经验中国故事。这些正是我们在国际社会提升中国话语权,增强中国软实力所需要的。

### 参考文献:

- 周黎安,2007:《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第7期。
- Atkinson, A. B. et al(2011), “Top incomes in the long run of history”,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1):3-71.
- Card, D. & S. DellaVigna(2013), “Nine facts about top journal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1(1):144-161.
- Chow, G. C. (1993), “Capital form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8(3): 809-842.
- Cronin, B. (2001). “Hyperauthorship: A postmodern perversion or evidence of a structural shift in scholarly commu-

- nication practice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52(7):558—569.
- Démurger, S. (2001),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An explanation for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9(1):95—117.
- Groves, T. et al(1994), “Autonomy and incentives in Chinese state enterprise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09(1):183—209.
- Hamermesh, D. S. (2013), “Six decades of top economics publishing: Who and how?”,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51(1):162—172.
- Hudson, J. (1996), “Trends in multi-authored papers in economic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0(3):153—158.
- Jin, H. et al(2005), “Regional decentralization and fiscal incentives: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0):1719—1742.
- Li, H. B. & L. Zhou(2005),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89(9/10):1743—1762.
- Lin, J. Y. (1992), “Rural reforms and agricultural growth in Chin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2(1):34—51.
- Kuld, L. & J. O’Hagan(2018), “The trend of increasing co-authorship in economics: New evidence”, <https://voxeu.org/article/growth-multi-authored-journal-articles-economics>.
- Milanovic, B. (2002), “Tru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1988 and 1993: First calculation based on household surveys alone”, *Economic Journal* 112(476):51—92.
- Montinola, G. et al(1995), “Federalism, Chi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basis for economic success in China”, *World Politics* 48(1):50—81.
- Narayan, P. K. (2005), “The saving and investment nexus for China: Evidence from cointegration tests”, *Applied Economics* 37(17):1979—1990.
- Ossenblok, T. L. B. et al (2014), “Coauthorship of journal articles and book chapters 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2000—2010)”,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65(5):882—897.
- Popkin, B. M. (1999), “Urbanization, lifestyle changes and the nutrition transition”, *World Development* 27(11):1905—1916.
- Rath, K. & K. Wohlrabe(2015), “Recent trends in co-authorship in economics: Evidence from RePEc”, CESifo Working Paper, No. 5492.
- Ravallion, M. & S. Chen(2003), “Measuring pro-poor growth”, *Economics Letters* 78(1):93—99.
- Ravallion, M. & S. Chen(2007), “China’s (uneven) progress against poverty”,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2(1):1—42.
- Seltzer, A. J. & D. S. Hamermesh(2018), “Co-authorship in economic history and economics: Are we any different?”, *Explorations in Economic History* 69:102—109.
- Stern, D. I. (2004),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World Development* 32(8):1419—1439.
- Weingast, B. R. (1995),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 Organization* 11(1):1—31.
- Xu, C. (2011), “The fundamental institutions of China’s reforms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49(4):1076—1151.
- Young, A. (2000), “The razor’s edge: Distortions and incremental refor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5(4):1091—1135.

(责任编辑:杨新铭)

(校对:陈建青)